

# 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法〕 维吉尔·毕诺 著



商务印书馆

# 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 形成的影响

〔法〕维吉尔·毕诺 著

耿 昇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0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法)毕诺著;耿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ISBN 7-100-02635-0

I. 中… II. ①毕… ②耿… III. 哲学思想—法国—影响因素—中国 IV. B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5852 号

ZHONGGUO DUI FAGUO ZHIXUE SIXIANG  
XINGCHENG DE YINGXIANG

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  
形成的影响

[法] 维吉尔·毕诺 著  
耿 昇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2635-0/G·359

---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3 1/4  
印数 5000 册

定价: 36.00 元

## 译 者 的 话

提起中西哲学思想和科学文化的交流,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但在 17—18 世纪,中国对西方的影响可能要比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还要大,这一点却很少有人提到。中国的重农主义、文官科举制度、修史传统、伦理道德、完整的治国之术、多种文化派别的并存与争鸣、以及哲学思想界经常出现的大论战等,都对西方哲学思想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欧洲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中国礼仪之争,在西方哲学、神学和理论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当时的法国哲学大师伏尔泰、魁奈、孟德斯鸠、圣西门、马勒勃朗士、蒙田等人在形成他们各自的哲学体系时,都从历史悠久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虽然,法国启蒙时代的这些哲学巨匠们从未到过中国,也都不懂中文,他们都是通过入华耶稣会士们的介绍而间接地利用中国资料以构筑其理论体系的。因此,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往往不准确,不全面,甚至带有主观臆想,生硬地用西方的思想来解释中国文化的成分。但是,这是欧亚大陆两极的两种哲学思想和文化首次大规模的冲撞和最早的交流,它代表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创阶段,也可以说是这种交流的源头。所以这一阶段的历史尤其应该作深入地探讨。

法国学者维吉尔·毕诺(Virgile Pinot)的《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就是研究 17—18 世纪(1640—1740 年)中法乃至整个中西哲学思想和文化交流的一部学术水平很高的专著,是以

宏观上论述的代表作。该书自问世之后,成了国际学术界研究这一内容的一本不可多得而又必不可缺的参考书,受到了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作者从宏观上论述了 17—18 世纪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尤其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冲撞、影响及造成的后果。他对法国人自西东来的过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许多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观点也比较公正客观。

毕诺主要是一名法国哲学思想史专家,其观察问题的角度和研究问题的方法,不仅与中国人不同,而且与法国及西方的汉学家们也不同。他立足于法国哲学思想史,从中揭示出受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影响并且汲取了中国文化营养的成分,巧妙地将中国文化史与法国文化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论述,深入分析,从整体上得出了概括性的结论。这种做法在外国的中国学研究领域中还未曾有过先例。因为西方的汉学家,往往懂得中国史而不精通本国史,精通本国史的学者对于中国史又不甚了解,这两个领域之间似乎总有一条鸿沟相阻隔。毕诺的这部书可以说打破了这种阻隔,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开辟了新的蹊径。考虑到这部书的重要意义,所以我不揣简陋,把它译成中文出版,以飨我国学术界。

本书原本共分两卷。第 1 卷是正文《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第 2 卷是资料集《有关法国认识中国的未刊文献》,主要是首次刊布了法国人华耶稣会士与法国学者们于 1722—1737 年间交换的有关中国的书简。为了中国读者阅读方便,我在中译本中将两卷合为一卷,将本来位于第 1 卷末的《参考书目》移至全书之末,请读者注意。

本书是我于 1990 年前后译出来的,后来不断加工修改。在翻

译过程中,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神哲学院前任院长涂世华主教帮助我解决了一些拉丁文词句,谨此致谢。由于译者水平所限,错误和欠妥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1996 年于中国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VIRGILE PINOT*  
**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RANCE**  
(1640 – 1740)

根据斯拉金书店 1971 年日内瓦版译出

## 前 言

当大家阅读 18 世纪的著作时,无论是游记还是报刊文章,是由哲学家还是由经济学家写成的论著,都会特别惊奇地看到非常频繁地出现中国的名字,发现有关令人赞赏的中国的大量资料。我们仅仅通过资料的数量来看,中国就似乎比英国本身更时髦得多,虽然英国对同时代各种思想的影响非常大。中国无疑在 18 世纪是风靡一时。

东方,特别是中国,以不同风尚的表现形式,已由卫匡国(M. Martino)神父做了描述,我无须对他的著作再做重述了。但是,我所说的“风尚”肯定不是指影响。人们可以照伦敦方式穿衣戴帽,却对英国人的意识一窍不通,也可以丝毫不借鉴英国人的思想。在 18 世纪的法国,人们可以使小说或悲剧中的人物按照中国方式梳妆打扮后出场,但不必使这些人具有任何一点中国人的特征。人们可能会使用中国明代的瓷器饮茶,甚至还可以云山雾海地议论孔夫子,而不会感到有任何根据中国人的思想来改变自己的伦理或政治观的必要。甚至对一个外国民族的仰慕,也并不一定是该民族对其钦佩者施加过影响的确切证据。当时许多人的思想状态也可能与圣-埃弗雷芒(Saint Evremond)相同,此人已准备赞扬中国人的道德,但他不想迁往北京生活,因为在那里既找不到黄油,也吃不到牡蛎。博学而又认真的学者马蒂厄·马雷(Mathieu Marrais)虽然使用了一些不太准确的汉文术语,但却准确无误地

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这些人对中国的仰慕并未使他们产生“自我灌输中国的意识”的愿望。

为了具有“自我灌输”一个外国民族思想的愿望,似乎首先应该是自己在思想或感情上感到惴惴不安,它会妨碍对直到那时为止形成文化和伦理道德生活的一切因素感到心满意足的感情。此外,还必须使这个外国民族恰恰在表现出这种惴惴不安的时候出现,以带来能满足自己需要和愿望的因素,虽然这些需要和愿望尚未出现和尚未被人意识到,但确确实实是很迫近了。帕斯卡尔(Pascal)的话在这里也很适用:“如果你未曾遇到过我,那么你就不会寻找我”。如果贝尼埃(Bernier)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坚持翻译孔夫子的伦理学著作,那是由于他在经过 50 年研究哲学后,对自己曾认为是最可靠的事业产生了怀疑。孔子以其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政治观,向他提供了不仅仅能满足他过去始终都表现出的那种哲学家的内涵;而且也满足了那位再不想仅将其思想体系建立于浮云之上,而是试图牢固地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已进入老耄之年的哲学家感到满足的内容。

因此,我将冒险在敏感的时代,在危机(个人危机或社会危机)时候寻找一种外来影响。中国的情况即如此,它主要是在两个时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一是在 1685 年后,当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宗教、政治和经济思想进行仔细反思时;其二是在 1760 年后,正当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试图开创一种做为政治和伦理道德基础的社会科学时代。但我们应该指出,在中国影响最突出的时代,也就是说在 1760 年之后,直到 1750 年左右为止,始终做为一种信条的崇拜和仰慕中国再也不是那样的狂热了。当时,人们甚至也怀疑中国

人的道德。大家都把中国政府列入了专制政府的行列。重农主义者,为了使人接受中国政府作为一切善政的楷模而被迫创立了“合法专制主义”论<sup>①</sup>。此外,以中国为时髦之风气的鼎盛时代,并不与中国产生影响的那些时代相吻合。中国热的高峰发生在 1745 和 1755 年间,即当蓬巴杜(Pompadour)夫人为此定下基调、并在身边囤积中国古玩作消遣时,这正是东印度公司获得巨额利润(后来就减少了)的时代,也是布歇(Boucher)绘制他的中国仕女像的时代。当时,所有的人都希望在其房间布置一些带有中国内容的画屏。毫无疑问,如果声称这种时髦对后代没有产生影响,那就大错特错了。“合法专制主义”理论的缔造人魁奈(Quesney),原来是蓬巴杜夫人的医生,与她亲密无间地相处。在艺术和文学发展的一个特定时代,时髦和影响这两条曲线始终是彼此独立的。虽然它们在一段时间内偶尔也会互相靠拢和结合在一起,可是它们却各自保持了其固有的个性。

我意欲研讨的恰恰就是中国在 18 世纪对法国的思想和风俗习惯的影响,而不是其他任何内容,但也并不因此而在有机会的时候,忽视论述有关欣赏中国古玩的时髦风气,以及在某些时代发生的影响。我原想仅用一部著作来论述这项内容,以伏尔泰(Voltaire)为中心,因为他往往被视为中国“道德”的最大鼓吹者。不过,我又必须考虑到,在伏尔泰论述中国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首先关心的和最偏爱的是博学多艺的人、学术家和哲学家。在 1640—1740 年间,情报信息的传播工作进展得非常缓慢。

---

<sup>①</sup> 毕诺:《18 世纪的重农主义者和中国》,载《近代和当代史学报》第 8 卷,1906—1907,第 200—214 页。

只有在占有很多知识,才能成功地理解中国人的历史纪年、古代史、哲学和伦理道德。因此,只有首先了解这种“中国热”形成的整个阶段,我们才能知道伏尔泰向其先驱们借鉴了多少内容,此后才可能知道他个人的贡献究竟有多少。

在论述“伏尔泰与中国”(我们希望这一天绝不会再拖延很久了)之前,则必须研究中国对我们 17 世纪的哲学思想形成产生的影响问题。

此外,在研究 18 世纪上半叶有关中国情况的著作时,人们对以下事实不会不感到惊奇:除了某些没有多大价值的游记著作外,完全是入华耶稣会士的著述。某些人对这些著作的公正性提出了反对意见,如圣西门(Saint-Simon)、弗雷烈(Frérét)以及其他某些人,尚且不包括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以及多明我会士等耶稣会士的敌对者。因此,我必须对这些著作进行考证性研究,以便知道耶稣会士在 18 世纪初叶是否向我们提供了有关中国的正确(我并不要讲非常确切)的或至少是公正的思想。这样的考证研究也具有历史意义。由于中国的礼仪而发生了争论,这批著作中有一些引起了轩然大波。礼仪之争持续于 18 世纪期间,有关中国的主要资料——《耶稣会士书简集》和杜赫德(du Halde)神父的《中华帝国全志》成书的整个时代。

在发表这种全面研究中国与 18 世纪的法国哲学思想的第一批基本著作时,如果不向古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先生致谢,那我就是严重失礼,我指的是致谢之礼,同时在其他方面也有小的失礼。朗松先生非常热情地于 1905 年(我当时尚为巴黎大学的学生)向我指出了中国对我国 18 世纪思想发展的重要影响。从那以后,他不断地鼓励我完成自己针对这一问题而撰写的著作。

他出于一片盛情(我不知道应如何感激他),不仅仅向我提供了具有很高实用价值的资料,而且还向我做过必不可缺的指导。衷心祝愿此著不要过分辜负他的殷切期望。

我不仅必须在普通藏书馆(国家档案馆、国立图书馆、海军图书馆)研究大批稿本著作,而还要到各个特藏馆去搜集资料,如巴黎天文台图书馆和海军水文地理测量局图书馆(收藏有海军的地图和平面草图)。我在这些地方始终都受到热情欢迎,我将永远保持对他们的衷心感谢。我还特别要向隆德大学皇家图书馆(瑞典)的官员们致谢,他们不仅满足了我使用他们藏书的要求,而且还非常乐意地为我找到了瑞典或外国其他图书馆的著作和手稿。因此,我必须于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 目 录

|           |     |
|-----------|-----|
| 前 言 ..... | (i) |
|-----------|-----|

## 第一卷 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                       |     |
|-----------------------|-----|
| 第一编 有关法国认识中国的资料 ..... | (2) |
|-----------------------|-----|

|                          |     |
|--------------------------|-----|
| 第一章 耶稣会士和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 ..... | (2) |
|--------------------------|-----|

|                          |     |
|--------------------------|-----|
| (一) 17 世纪远东的天主教传教区 ..... | (5) |
|--------------------------|-----|

耶稣会士们到达之前的中国传教区——耶稣会士传教区的起源——17 世纪在华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耶稣会士——入华耶稣会士和手工艺——博学中国之传说的形成。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起源——教皇在远东建立一种独立于民族教会的修会之愿望——困难：葡萄牙人在印度的保教权和法国教会自由论。

教会强加给传教区的宗教人士的誓辞事件——法国国王根据法国教会自由原则而作出的反抗——柯尔贝尔向中国派遣国王数学家耶稣会士想法的源出——罗马对这项计划的不信任态度——数学家耶稣会士匆匆忙忙地出发赴暹罗和中国。

|                                  |      |
|----------------------------------|------|
| (二) 出使暹罗的法国使节(1685—1687 年) ..... | (44) |
|----------------------------------|------|

肖蒙骑士的出使(1685 年)——他的指令——宗教问题优先于贸易问题——康斯坦斯·帕夫尔孔——他的口是心非——他的真正意图——塔查尔神父的作用——拉鲁贝尔和

赛伯赖的态度——他们的指令——贸易问题从此占据了首位——塔查尔神父作为暹罗国王派向法国国王和教皇的使节而返回欧洲——他们的指令：要求教皇取消宗座代牧和巴黎外方传教会以有利于耶稣会士——他仅仅获得取消誓辞——调解的尝试——使这些计划化为子虚乌有的 1688 年的暹罗革命。

## 第二章 中国的礼仪之争 ..... (70)

马拉巴尔的礼仪之争——耶稣会士与其他修会会士们的布教方法之根本区别——入华耶稣会士们认为必须与尊孔和祭祖的礼仪妥协和解——斗争的序曲——帕斯卡尔向法国大众揭示了这份争论——《耶稣会士的实用伦理学》第 2 卷——朱里厄支援冉森会士，阿尔诺先生的思想——耶稣会士们的反击，勒泰利埃神父的《为中国的新基督徒辩护》。

严嘉乐抨击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礼仪的主教教谕（1963 年 3 月 26 日）——耶稣会士们的回答，李明神父的《中国现势新志》。——中国礼仪之争与其他神学和宗教争论的关系，“哲学罪孽”事件——“寂静主义”的事件——1700 年——巴黎大学在中国礼仪的诠释问题上对耶稣会士们的贬责——教士大会对耶稣会士们的放荡伦理的批判——博絮埃和巴黎大主教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拯救不信教者的问题。

中国礼仪事件在罗马——德·诺阿耶红衣主教的代理人东方学家雷诺多的作用——教皇向中国派遣了一名特命全权大使——铎罗主教率领的教皇特使团——他既未在中国也未在欧洲结束争论——诺阿耶红衣主教的代理人罗斯莱神父在罗马的活动——勒泰利埃神父成了国王听忏悔的神父——他要求罗马贬责凯斯内尔神父书中的 33 条建议——

耶稣会士们的反驳,要求抨击儒旺希神父的书——勒泰利埃神父控告凯斯内尔神父书中的 70 条新建议——“独生子通谕”——“自彼时通谕”教皇法(1715 年)——严嘉乐的出使(1720—1721 年)——8 项“许可”未能结束礼仪之争——圣上主圣意谕(1742 年)通过对耶稣会士们的贬责而结束了斗争——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的主要著作在一种战斗气氛中发表。

### 第三章 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的著作…………… (158)

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的大量著作,其中仅有小部分已刊布——删节这些文献的原因,巴黎的耶稣会士们想到了始终都留作悬案的中国礼仪之争。

《中国的哲学家孔夫子》和柏应理神父有关古代中国人宗教的序言——巴黎校阅者们的修改,他们倾向于让人相信古代中国人信仰一尊创世的上帝和灵魂不死论——《耶稣会士书简集》,它们那假直率天真的外表。巴黎的编者删去了论述中国人迷信,尤其是关于他们信仰神鬼的文献——杜赫德神父的《中华帝国全志》,他掌握的丰富的原始文献——遗漏、删节和修改——这些歪曲篡改的原因,试图通过事实证明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礼仪的理论。

耶稣会士们通过他们有关中国礼仪的理论——他们试图对此作出的论证而为 18 世纪的唯理论和伏尔泰的自然神论工作。

## 第二编 法国发现中国及其哲学思想的形成…………… (212)

### 第一章 中国历史的古老性及历史纪年…………… (212)

最早有关中国的记述指出了中国的古老历史——拉佩雷尔以其亚当之前人类说的论点否认诺亚洪水的普遍性并暗示世界无始无终的永久性思想——某些亚当之前人类说

的主张者,德国的居伊·帕丹、克努特真和稍后不久的培尔——卫匡国神父认为中国在诺亚洪水之前曾有人居住——以撒·沃西攸斯将世界的起源向后推——与霍尔恩的辩论——里奇奥利神父接受中国的纪年,但使用了七十子译本的希腊文《圣经》——柏应理神父的纪年著作,表面的大胆鲁莽和内心的谨小慎微——阿利克斯——佩泽伦神父由于中国纪年而放弃了拉丁文本的《圣经》并采纳七十子译本的希腊文《圣经》——拉鲁贝尔和喀希尼、他们对中国纪年真实性的怀疑——瓦勒蒙拒绝接受中国纪年——严嘉乐相信中国的纪年很古老,但对它作了压缩以使之与《圣经》相吻合——图尔内米内神父为使拉丁文本和七十子译本的希腊文《圣经》相吻合而作的假设,从而使人可以接受中国的纪年——新教徒迪哈梅尔接受这种假设——反应:唐·卡尔梅和雷诺多否认中国历史的古老性——相信世界之古老性的和持亚当之前人类说的不信教者,蒂索·德·帕托和《突厥人的密探》的继承人——对诺亚洪水普通性思想的攻击,朗格莱—迪夫雷斯诺伊、莱弗斯克、德·布里尼。

耶稣会士们对中国古老历史的研究——3种理论:象征论者、在北京的史学家神父们、巴黎的神父们。

弗雷烈——他的方法:以中国历史本身和不顾及任何宗教思想地证实中国历史的真实性;他的小心谨慎使中国历史可以压缩和不会在任何方面都引起神学家们的不安。

这场1740年之前运动的影响;大家更加倾向于怀疑普天下的洪水而不是中国纪年的古老性。

## 第二章 中国人的哲学和宗教…………… (322)

### (一) 传教士和神学家…………… (324)

金尼阁神父:民间的迷信与士大夫中的唯物论和天神论

——拉莫特·勒瓦耶在孔夫子的教理中发现了自然宗教和伦理——卫匡国神父提供了支持中国人无神论的事实以及支持他们的唯灵论观点——两名普遍接受原则的支持者，伯里埃神父和于埃——柏应理神父遭巴黎耶稣会士们的训斥，中国的宗教与犹太教和基督教同源——拯救不信教者的问题和斯芬德拉梯红衣主教的书——5位主教的书简——1700年——巴黎大学对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人宗教思想的贬责——对古洛的评价以及伊德的书——博絮埃和埃利埃斯·迪·潘的批判——外方传教会神学院以发表龙华民和利安当神父的论著而设法证明中国人的无神论。

## (二) 哲学家 ..... (363)

培尔——1700年前的培尔，他对宗教和伦理的关心、宽容态度以及宗教和伦理的关系，他援引暹罗和中国文人的无神论。1702年，他肯定了中国文人教派的无神论。1705年，为了破灭“普遍赞同”的论据，他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无神论——埃利·伯努瓦斯特，培尔的批评——受耶稣会士的敌人德·利奥纳启发的马勒伯朗士接受中国人的无神论观；莱布尼茨捍卫中国人的唯灵论，中国的古文献再现了自然宗教的原则——对龙华民神父的小册子的批判——列维斯克·德·布里尼用中国的例证设法证明无神论为古代哲学家们的教理，这就是复归的普遍接受的论据——弗雷烈：孔夫子拥有一种仅供其弟子们运用的秘密教理，官方的教理纯粹是伦理性的，既不论述玄学，又不讲宗教。秘密教理显示了斯宾诺莎主义的明显踪迹。因此，中国文人都是泛神论者和无神论者。

所以，除了莱布尼茨之外的哲学家们都同意耶稣会士对手们的意见，坚持认为中国人是无神论者。由此而重现了被